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中間派』的一次考驗

鳳岡

『國大』直前的最後一次和談中，所謂『中間派』的政團遭到了一次不很嚴重的考驗，但這考驗已經顯出了某些『中間派』的原形，打破了不少好心腸的民主人士的幻想，迷糊了最大多數民主派下層羣衆的意識，因而相當減低了這些羣衆的熱情；不過在另一方面，這考驗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確認識，同時也暴露了史大林主義者在這問題上的執迷不悟。

『中間派』這次考驗，對於我們倒不失為一個寶貴的實例教訓。

對於這個『中間派』的領導者『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途，我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由於這個階級的地位使然，牠之參加到中間派的民主運動中來，與其說是領導這個運動，倒毋甯說是來控制這個運動，利用這個運動的。他們所以要這樣幹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被屏於金融官僚買辦的集團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態來要挾一下吧了。將來，他們或者控制不了這個運動，或者業已利用了牠而得到了相當讓步，那末這個『民族資產階級』都會與國民黨立即妥協的。』（見本刊第八期論『中間派』）

在同一篇文字的另一個地方，關於整個『中間派』的前途，我們又說過如下的話：

『或者，被上層『民族資產階級』所出賣，中間派的政治運動在硬壓與軟騙之下給撲滅下去；或者，中間派的羣衆在向左急進的路上，逐層捨棄其上面的妥協分子，以致最後剩着城

鄉勞苦小資產者大眾，他們團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實行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建立工業政權，以此根本解決中國的各個難題。』

我們這些個論斷原沒有什麼希奇，只是些馬克思主義的老生常談，但因史大林主義者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將人們的思想導入了最庸俗的階級合作理論，以致我們這點點常識性的分析，在烏煙瘴氣的政論空氣中，竟顯得是可貴的預見了。

此次『第三方面』的散夥，正祇是『中間派』發展路上的第一步，因之也祇是部分地證實了我們的預見，即：『業已利用了牠而得到了相當讓步』，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已經『與國民黨妥協』了。

第十三期目錄

『中間派』的一次考驗	鳳岡
『十一卅』鬥爭底教訓	舒嚴
美國煤礦罷工屈服以後	劉默
反蘇大陰謀（書評）	舒嚴
致紐倫堡戰犯法庭書	威爾斯等
一位戰友之死（廣東通訊）	孫桂華
國際鬥爭	
荷蘭兵士和工人示威反對出兵印尼	盛
意大利革命運動	盛
在意大利的德國戰俘要求回國	盛
墨西哥農民也奪取土地	盛
印度紡織工人罷工	盛
希臘史大林派和托洛次基派公開辯論	盛
社會主義青年團體開國際會議	盛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中古船塢李振聲	盛
新旗社	盛

此後，請讀者們記住我們上引的論斷，真實的事變還會一再加以證實。

不過一個革命者決不是『預言家』，他的責任絕不在於等待『預見』之被消極的證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與宿命論無緣，他的全部任務是要發見『天定』的法則，由此以『人定勝天』。既然民主派的發展業已部分證驗了我們的預見，那我們的責任就不許我們站在旁邊冷看等『全部預見』被證驗了再來說『先知』式的風涼話。我們不能這樣做，也不忍見民主派的大眾被這樣對待。當此事變第一次打擊了民主派的腦殼之時，革命者的良心祇准他對人再度提出積極的警告，再度指出正確的道路。

不過先讓我們看看中國的史大林主義者對此事

件是如何說法的。在十三卷七期的《羣衆週刊》上有兩篇專文關於『第三方面』，其中主要的意思有如

下的一些：

『……經過這一次參加國大問題的試煉，民主同盟却愈顯出其精神。……』

『……其他誠心投考不幸落第考生（指民社黨——岡）只要用功上進：人民決不絕人之路，這一次落第了，以後還會有投考的機會，還會有錄取的希望！』

『落第的所以會把考題看漏，是因為他們各人都有某種心理作祟；一念之差，竟遺終身之恨！其中最大最凶的一種病，是有意要對中共立異。……』

『我們祈求中國民主同盟必須繼承和發揮它自己底光榮傳統……學習上海民主促進會與香港民主促進會結成一體的好榜樣，以便集中力量……』

中國的史大林主義者從『民主派』上層的第一

次分裂上得出了這樣的教訓。他們不肯『絕』張君

『一念之差』，只要他們以後聽我們的話：『一人做事，最要緊』……如何如何，再把各個領袖的『民主團體』，像蔡廷楷將軍的組織一樣團結起來，那末『民主派』就可以接近勝利』了。

比任何誑騙更有毒的誑騙！

在史大林主義者的頭腦裏，階級是沒有的，羣衆也是沒有的。以青年黨及民社黨為代表的一些資產階級地主的官僚政客，其所以在『國大問題』上『投考落第』，在他們看來，不是因為階級關係，即不是因為國民黨和這些黨派同屬於中國上層的占有階級之故，而是因為『一念之差』！就是要對『中共立異』；從這裏，作者潘梓年先生便得出一個『大經驗大教訓』，向那『落第』的考生們說教道：

『一人做事，最要緊是要有自己的是非；不問是非而隨聲附和，固然是喪失了自己，不問是非而居心立異，不也一樣是喪失了自己嗎？』

『書生黨魁』張君勸讀到了這段文字，一定會打個大哈哈，取笑這更加書生氣的潘梓年吧。張君勸完全懂得自己的一套，很清楚自己的黨和牠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應該在什麼問題上與在何種限度內對國民黨『立異』，或對中共『附和』。他絕對不需要潘梓年替他規定下『凡人：必須』的教條。

『民主派』領袖們作此種戲劇式的分裂與投降，使得『民主派』羣衆迷惘而苦悶了。對於他們，一個革命者是應該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給他們以滿意的解釋與指示的。可是中國的史大林主義者祇對他們說：『民主同盟愈顯出其精神』了，不要『絕人之路』，這些『變節』的領袖們不過是

這是我們從此次『民主派』考驗所能得出的真正的『大經驗，大教訓』！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卅』鬥爭底教訓

舒 嚴

十一月卅日，上海黃浦警局門前攤販和警察的衝突，以及十二月一日幾乎普遍全市的罷市，這個大風潮發生時，上海老市民，凡會見過五卅運動的，都說：自從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那次事變以來，上海從未會見過這般普遍而激烈的羣衆運動了。

這次『十一卅』事變和那次『五卅』事變，確是有許多共同點的。二者都是市民羣衆自發的運動，都是起因於向警局（那時稱爲『巡捕房』）索取被捕的無辜市民，都是警察（那時稱爲『巡捕』）向羣衆開槍，都是羣衆死傷而激起全市罷市。

可是二者後果相差得多麼遠！『五卅』開始了一個革命，中國近代史最大的羣衆革命，羣衆運動從這個事變出發，繼續高漲下去，罷市之後繼以罷工，上海之後繼以各大都市和鄉村，以此引入北伐和土地革命。『十一卅』之後，沒有甚麼後繼了，第三日尚有一點騷動，從第四日起就完全平靜了，現在不到一個月就已被人淡忘了。

爲甚麼呢？原因是很多的，但主要的是：那次事變發生後有革命黨來領導牠，而這次事變發生時並沒有這樣一個領導的黨。

上海當局，當事變一發生時就叫喊：『有暴徒搗亂』了，或『共產黨陰謀』了。這叫喊很可表現統治者底害怕，他們並不害怕赤手空拳的自發的羣衆，但害怕有個革命黨，像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共產黨那樣，來領導這自發的運動。倘若有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存在的話，則罷市首先會表現爲店員以及一部分商人同情援助的形式，而接着交通工人，市政工人以及一般產業工人都會罷工表示同情了。如此

很有可能開始中國第三次革命。當局所害怕的是這樣一個前途。所以事變一開始，當局就防止牠走這個前途，就叫喊『暴徒搗亂』和『共產黨陰謀』來提高自己的警覺性，來替更野蠻的鎮壓手段做辯護。其實此次事變證明出是小市民正當的求生鬥爭，并不是甚麼『暴徒搗亂』，而現在的共產黨即使有陰謀，也不會行使在這方面了。

『十一卅』事變同草堆上的火災一般消散了。但僅從牠的自發性來說，也有許多教訓是我們不可輕忽過去的。

首先，『十一卅』本身表現的力量是超過『五卅』本身的。二十一年前包圍老闊巡捕房的羣衆並沒有此次包圍黃浦警察局的那麼多，與巡捕相持的並沒有此次那麼長久，而開槍後接着的行動也是沒有此次那麼迅速和整齊的。同是自發的羣衆運動，但此次羣衆自身表現得更有經驗得多了，更有力量得多了。

其次，就羣衆底直接要求說，此次運動可說已得勝利。被捕的無辜市民釋放了，攤販的權利恢復了，至少不像以前那般受干涉了，攤販底要求得到一般市民同情了。這反過來加強了羣衆底自信心。這次不過是一種斥堠戰，增加了經驗之後，將來即使仍是自發的運動，也將是更有力量的。

最後，更重要的是城市廣大羣衆運動，經過將近二十年沉寂之後，又抬頭來了。上次革命失敗得如此悲慘，以致城市廣大羣衆首先退出政治舞台。這十九年來，鄉村農民不斷地此起彼伏鬥爭，甚至武裝鬥爭形式也未間斷；城市學生，一般智識分子，以及上層的小資產階級，雖比農民消沉，也會有過幾次起來鬥爭，如北平的『一二九』，如昆明的『一二一』，如今年上海的『六二三』；可是城巿工人以及一般下層羣衆，除了個別的罷工或怠工，革

之外，就未曾動過。一般人不明白這是統治階級壓迫太甚和共產黨路線錯誤所致，反而懷疑無產階級底力量和作用，甚至一般廣大羣衆運動底力量和作用。人們祇看見『武裝鬥爭』一個方式，或者『政治協商』方式，那也是以武裝力量爲後盾的。人們看不見城市羣衆鬥爭方式，不知道中國革命也是同近代世界各國革命一般，都應當以城市廣大羣衆鬥爭爲主力的。

此次『十一卅』事變是十九年來第一次告訴我們：城市廣大羣衆確有力量，確能鬥爭了。以攤販爲主的羣衆已有這般的力量，何況以產業工人爲主的羣衆？自發的運動已有這般的力量，何況有革命黨自覺領導的羣衆？我們已經認識了城市廣大羣衆有力量，再進一步去認識革命應當以城市廣大羣衆爲主力，應當以無產階級爲領導，就不困難了。

全世界已在革命發酵中了，各國工人都已崛起不僅作經濟鬥爭，而且作政治鬥爭了。中國工人沉默了十九年還能再沉默下去麼？此次事變告訴我們將有更大的風暴到來，中國工人，尤其上海工人，將恢復『五卅』時代的革命精神。我們的責任就在如何給自發的鬥爭以有計劃的領導。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唐盛譯

新旗叢書之一 春燕出版社印行

此書係托洛次基一九二四年所著，解釋一九一七年俄國從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經過以及布爾雪維克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等等。前有譯者長序，指出中國革命者必須吸取十月革命教訓；後又附錄『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那是托洛次基遺著『史大林傳』底附錄，因與十月革命理論分析有關，譯者特爲譯出的。

美國四十萬煙煤工人，爲了減少工作時間，改善生活待遇，在美國全部反動壓力的瘋狂壓迫之下，實行罷工了十七日，終於屈服下來了。

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大事情，不僅對於美國，而且對於全世界，部分地也對於我們中國。

因之，此次罷工發生的意義，其經過，其失敗，及其可能的影響，——成了每一關心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人所必需研究的題目了。

美國的煤礦工人，是美國工人階級中最富於鬥志的一部分。在大戰期內，當全體工會領袖與一部分工人受愛國主義的麻醉，自願放棄罷工權利的時候，獨有他們掙斷了這個軟索子，不管一切地實行了三次英勇的鬥爭；鬥爭以後，在風起雲湧的工人鬥爭中，煤礦工人又來了最出色的表演。他們的領袖約翰·路易士，——過去產業組織大會的主席，雖然也是一個老的改良主義的工會領袖，他反對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尊重私有財產與資本主義，痛恨一切徹底的階級鬥爭，但是無疑地，在所有那些腐朽與庸懦的工會領袖中，路易士是一個比較急進，較多鬥志，具有較遠眼光與較大野心，而且是最有能力與最不易妥協的。

如我們在上三期本刊上所連續指出的，美國的工潮正在方興未艾，正

發展到戰後的第三個階段；最近又以共和黨競選獲得勝利的結果，物價統制幾乎全部取消，工資的實際購買力驟形低落，美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一定會以更大速度及更大規模發展出來。同時另一方面，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爲要克服這戰後必將來臨的危機，爲要準備在較近將來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却以更大決心及更一致的步驟，要根本摧毀美國有組織的勞工勢力。

勞資雙方在相反的路向上突進，在煤礦罷工上發生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觸。不過二者的接觸不是完全偶然的。

美國的獨占資本家想用立法手段來禁絕罷工，或至少予罷工權以十分嚴格的限制，那是久有此心了。大戰以後，在第一次罷工浪潮的高峯時，那個有名論，乃至分裂工運方面，都顯然做得不够，所以在工人階級的堅決抗議之下，的反勞工的所謂『凱斯法案』於一月間提出於議會，但那時，統治者的佈置顯然不甚周密，以致提出來又收回了。到了五月間，在鐵路罷工被鎮壓下去以後，『凱斯法案』又被提出來，而且獲得了通過，可是那時候，無論在法律，輿論，乃至分裂工運方面，都顯然做得不够，所以在工人階級的堅決抗議之下，杜魯門總統不得不匆忙地否決了牠。獨占巨頭們遭遇了這次失敗，於是更努力

佈置對勞工的新攻勢，半年多來，隨着國際方面的積極政策，對於國內陣線的整飭更是不遺餘力：從政府首腦的肅清起，一直到勞工陣營中的『反共運動』止，無一不是爲要準備對勞工方面的決定性的打擊。到最近，這樣的佈置大體已經就緒了，於是『擒賊擒王』，抓住那美國最急進的煤礦工人的罷工，給美國工人階級以第一個有力的迎頭打擊。

這是煤礦工潮發生時的情勢及其遭受打擊的意義。

在這次衝突中，毋需說，失敗的是勞工方面。

爲什麼會失敗呢？主要因爲勞方在鬥爭目標與覺醒程度上，遠遠地落在資方與統治者之後。工人方面，尤其是工會及其領導者方面，仍只是把鬥爭目標限制成純粹經濟性的，他們的整個意識，還嚴格地限制在工資制度的範圍以內，希望由鬥爭來增加每月數元錢的收入；可是資本家方面呢？他們不再在幾元工資的高低上打算，不再囿於經濟性鬥爭的防禦與進攻，而完全着眼於政治方面，要根本取消工人罷工的民主權利，要使他們回復到無組織狀態，以便讓他們牽着鼻子，去進行第三次的人類大屠殺了。

一方面用的是古老的匕首，另一方面用的是最新式的機關槍，前者怎能不慘敗下來呢？

獨占資本此次對待礦工的手段，是完全出乎煤礦工人及其工會的意料——即他的意識——之外的。野蠻與周密，都達到了高度的完成。他們不顧『諾立斯拉加第亞法案』關於法院不能干涉勞資糾紛的規定，竟由法院發出禁止罷工的命令，復判處罷工者以巨額罰款；與此同時，政府不但調動了軍隊，而且動員了全部輿論，此外，最卑劣的，以行政手段造成了煤荒，例如工廠減工，學校停課，鐵路與郵政減運等等，使全國一般民心反對罷工者，因而忽略了政府取消民主權利的大陰謀。

這自然是未爲妥協的工會領袖所準備的；路易士一碰到這意外的打擊，憤怒了，礦工們更加憤怒了；但沒有適當的政治上的準備，這憤怒總祇有憤怒吧了，工會方面顯出了手足無措，路易士不得不根據他『善良的信念』而下令復工。

什麼叫做『適當的政治上的準備』呢？首先得認識資本主義目前所到達的時代，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地位，其企圖及其對工會所能容許的限度；由此認清楚工會今後所能起的作用，所應做的事情。

路易士，不管他是工會領袖裏面最精明的，也總是屬於過去的了。這位在

『美國勞動聯盟』中起家，嗣後成爲美國產業工會運動領袖的老改良主義者，

總已經不適合於目前的階級鬥爭了。在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時代，工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構成部分，是牠所不可或缺的一個調節器，是牠的安全活塞。改良主義的工會及其運動與民主主義的政制是不可分離的。可是歐洲從第一次大戰後起，美洲從第二次大戰後起，世界資本主義顯然已經走出了牠的『和平』時代而走入了牠的『變亂』階段。換句話說，整個資本制度都已經歷牠的臨終的痛苦了。在這時期中，自由競爭讓位於獨占壟斷，民主政制讓位於或明或暗的法西斯統治；至於改良主義呢？那末如果不前進到革命主義，就勢必要被逼回到野蠻主義。這論斷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本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却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了。你們總該記得：德國有半世紀以上歷史的改良主義的工人組織，竟會在一夜裏被消滅得無影無蹤的！

但是這些殘酷的歷史教訓，對於其他國家的，尤其是對於美國的改良主義工會領袖們，完全是白過了。他們既不認識歷史的時代，更不了解工會作用的變化。因此，當統治的資產階級向工會提出：或者根本消滅或者成爲警察國家的一個機關——這個次擇時，這些工會領袖却仍舊顧慮不靈，斤斤於幾元幾角工資的增減，而絕對拒絕工會進行獨立的工人政治。

美國的工人團體（包括政黨與工會），除了社會主義工黨（即托派）之外，統統反對進行獨立的勞工黨的組織。在這次議會選舉中，從保守的『美國勞動同盟』起一直到美國的共產黨，統統主張擁護民主黨的候選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懂得：除非美國龐大的工人階級組織獨立的政黨，進行對資產階級任何一派完全獨立的政策，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工農政府，則美國現有的一點工人組織力量，連同他們數十年來所爭取到的民主權利，都將被日益戰爭化與法西斯化的統治階級所剝奪的。

改良主義者不懂得這個真理，已在煤礦工潮的失敗中喝到第一杯苦酒了。不過在另一方面，這個失敗，對於尚都蒙在改良主義迷夢中的美國工人階級，未始不是第一個警號，告訴他們古老的經濟鬥爭的方法已經走到了盡頭，此後即使爲了改善一點生活，也必須跟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治鬥爭聯在一起了。

路易士突然改變了態度，接受了失敗，停止了罷工，也許是感覺到了舊路不通，回頭來準備新的政治的鬥爭吧（例如贊成組織英國式的工黨）？

不用說，我們絕對不能寄託希望於路易士之類的領袖，不過鬥爭的真實過程，從來比任何論據更有力些；事變繼續發展下去，美國的工人大衆一定會在近期間走上政治鬥爭的路，並逐漸地或激劇地轉入革命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

去的。

此次煤礦罷工失敗的又一原因，在於美國工人團體的步調不一致，鬥爭不能配合。當煤礦工會被判『有罪』，四十萬礦工表示極度憤慨的時候，『產業組織大會』雖然表示了同情的援助，主張勞工團結，鐵路工會也響應了這個號召；可是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上的聲援，更壞的是那『美國勞動同盟』，牠的主席席格林，不管礦工聯合會是他屬下的一個單位，却採取了『中立』態度，主張山勞資仲裁來代替法庭。結果，四十萬煤礦工人陷於孤軍奮鬥，立於極不利的地位，以至不得不失敗而復工了。

這次煤礦工人的失敗多半要成爲『成功之母』的。獨立的政治鬥爭與工人階級的團結一致，不僅成了今後美國工人在階級鬥爭中取勝的必要條件，抑且是保衛民主權利的一個起碼條件。這一點，事實會很快叫美國工人大衆接受。煤礦罷工對世界尤其對中國給了這樣一個不含糊的信號，美帝國主義在向第三次大戰的路上，已大大地加快其脚步了。牠爲了要替原子外交打氣，在內政上也開始應用原子壓力；美國內部民主權利的被逐漸剝奪，比原子彈的日夜製造更有力地表示了華爾街之決心掀起第三次人類的大屠殺。

煤礦工人的失敗絕對不等於美國工人階級的大失敗，美國資本家要想把自己的工人們完全按在地上，使他們一時不得翻身，那還需有更大與更多次的決鬥。在最後決鬥中，誰勝誰敗是未可斷定的。

不過這樣的決鬥顯然是愈加臨近了。我們，中國的工人們，應該懂得美國工人鬥爭所及於全人類命運的意義，所能及於中國的命運的意義，同時我們又應該知道反對我們自己的資本家與統治者，反對這些人後面站着的美帝國主義的靠山，不但解救我們自己，也是幫助我們美國的弟兄們。

世界是一家的，世界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家的。十二月十三日

傳自基次洛托

譯偉何
新旗叢刊之一

燕春出版社印行

『托洛次基自傳』初出版時，中國就有譯本，而且有三種譯本，但都不完全，即都沒有出版第三卷。現在我們這個新譯本可以彌補此缺陷了。這是一個刪節本，篇幅祇有原書三分之一，但第三卷刪節得最少。刪節者不是別人，正是托洛次基自己。他於一九三三年做這工作，用法文出版，以便利於法國工人的。書後，譯者還添入兩個附錄，一是從托洛次基日記抄出的，一是托洛次基底書記韓生所寫，記載他被刺經過的。

威爾斯等致紐倫堡戰

犯法庭書

評書

反蘇大陰謀

新旅 第十三期

Sayers和Kahn合著，梁純夫譯，《評論報》第二號起連載，已載至第七號。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莫斯科那幾次政治審判案，有許多地方說到了托洛次基及其他被告與德國納粹政府和蓋世太保互相勾結。一九三七年一月審判底決書中會說道：

本案偵查結果，確定了托洛次基會與德國國家社會黨領袖之一進行談判，意圖發動共同鬥爭來反對蘇聯。

根據被告畢亞塔可夫口供，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次基與該被告談話時，曾說談判結果已與上述國家社會黨領袖，成立了一個協定，其條件如下：

一、對德國政府採取一般善意的態度，並在最重要的國際性的問題上與之為必需的合作。

二、同意割讓土地。

三、以讓與權方式（或他種方式）允許德國工業家來蘇聯經營那些本質上屬於輔助德國經濟性質的產業。……

四、在蘇聯成立一些條件，便利於德國私人產業的活動。

五、在戰爭時，進行積極的活動，搗亂軍事工業和前線。這些搗亂活動，應依托洛次基與德國總參謀部協議後發出的訓令進行。

據托洛次基說，以上條件，已於托洛次基和希特勒代表赫斯會面時確實地議定而且同意了。（見《莫斯科審判筆錄》，一九三七年。）

莫斯科審判之後，由於「美國保衛托洛次基委員會」所倡議，及其他國家類此的組織所贊助，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這個『調查委員會』在

劇本上演，都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蘇聯從誕生以來的確受國內國外種種陰謀所進攻，陰謀現在還在進行着，而且是無奇不有的，而蘇聯是十月革命底遺產，牠的存在不僅是舊俄境內工農及一般勞動者所關心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所有被壓迫被剝削人類所關心的事情。

可是，我們從《評論報》已經發表的幾章看來，以及從日報上登載的此書目錄看來，卻發現此書本身就是反蘇陰謀的一個作品，就是牠自命為要暴露的那個『大陰謀』之中一個部分。

為什麼呢？因為此書將那真正保衛蘇聯，真正保衛這個十月革命遺產的努力，統稱為『陰謀』，與真正的陰謀混在一起，而有一種陰謀，最足致蘇聯死命的，反而不見提起了。這就是此書將蘇聯二大創立者之一托洛次基說做陰謀反對蘇聯的人，將托洛次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以及現在的第四國際行動說做反蘇的陰謀。認真說起來，書中說的那些真正的陰謀，如各帝國主義者對蘇聯的公開干涉和祕密進攻，以及蘇聯國內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分子底活動等等，不過是拿來做陪襯罷了，著書目的明顯的是『反托』，即反對那真正保衛蘇聯的人以及真正保衛蘇聯的手段。

在這一點上，此書著者們並沒有甚麼創見，他們不過重覆着十年來史大林及其指揮的特務機關（G.P.U.）底一種謊言罷了。

我們記得，從十年前，即一九三六年起，莫斯科有接連幾次的審判，結果整輩代的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即列寧底全部助手，差不多都被槍斃了，紅軍高級幹部，從總參謀長起，大部分被殺，全國實行血腥氣的『大肅清』，受影響的達到二千多萬人以上，最後放逐國外的托洛次基也逃不過G.P.U.雇用的兇手之手。這種歷史上空前的冤獄藉口甚麼罪名呢？據法庭正式的判決書說：這些被告，從托洛次基起，是與納粹黨人勾結，圖謀進攻蘇聯的。托洛次基在國外主持這個陰謀，而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拉狄客諸人，則在國內接受托洛次基底訓令，進行怠工，暗殺，為外敵侵略作準備。這些被告在法庭上受審時都自認犯了所控告的罪狀了，但沒有一點物證。法庭便是這般全憑被告口供而不靠物證判決了罪刑。法庭又指出托洛次基和希特勒之間有個協定存在，而此協定是經過納粹第三號領袖赫斯之手而簽訂的。

這個毫無事實根據的謊言，當時震驚了全世界。許多有正義感的人，不懂各國無產階級中的，而且一般社會中的，起來抗議。以美國老哲學家約翰·杜威為首，若干國際上知名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

美國開會，以有名的自由派政論家兼教育家約翰·杜威博士當主席，以作家兼記者蘇珊·拉福列特女士當書記，以薩可梵采狄案和托姆·穆奈案有名辯護士約翰·芬納普當律師。「委員會」其他的委員都是社會上知名的人士：社會主義者，教育家，編輯，記者，作家。據『委員會』以後印發的大本報告，諸委員自認為『……各人政治意見和社會意見大不相同，而且沒有一個是托洛次基政見底附和者。……』他們調查結果，關於與納粹合作一點，判定如下：

我們判定，托洛次基從未曾訓令莫斯科審判案中任一被告或任一證人去與外國訂立協定來反對蘇聯。恰好相反，他始終不妥協地主張保衛蘇聯。他是最徹底的政敵，反對那個外國所代表的法西斯主義，那個外國即他被控與之陰謀合作者。

根據所有的證據，我們判定，托洛次基從未曾主張，策劃或圖謀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恰好相反，他始終不妥協地反對蘇聯恢復資本主義，而且反對他國資本主義存在。（見『無罪』『委員會』在結論中說道：『……莫斯科審判案是羅織無辜』，而『……托洛次基……無罪。』（全上）

『委員會』在其報告中關於『勾結外國』部分末了做結論道：『我們認爲，陰謀勾結外國之罪名，不僅沒有證據證明，而且是荒謬不堅的。』（全上）

當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審判時，以及當一九三七年『調查委員會』工作時，雙方當然沒有可能從納粹方面得到證據，來證明或反駁托洛次基勾結納粹之傳說。但現在，情形變化了。蓋世太保底全部文件都在聯盟國手中了，而赫斯，莫斯

織了一個『托洛次基罪案偵查委員會』，即稱爲『杜威委員會』的，根據莫斯科審判所控告的罪狀，一件件偵查，而且親自審問了托洛次基及其他有關的人，并請各國政府協助調查證據。結果發現所控罪狀都是虛構，而宣判：托洛次基無罪了。『杜威委員會』會將審問托洛次基時的記錄以及『委員會』底判決書，印成兩厚本書，由哈渡兄弟書店出版。祇要不懷成見，凡讀了這兩本書的人都可以明白：莫斯科審判是如何荒唐無稽的。

可是，今天，莫斯科第一次審判十年以後，無須讀『杜威委員會』那兩本書，也就可以明白史大林和他的特務機關如何說謊了。因爲今天有了新的事實，比『杜威委員會』底偵查和判決更有說服力量。這是不久之前才結束的紐倫堡審判。

紐倫堡國際法庭是爲審判德國戰爭罪犯而設立的。德國戰爭罪犯是否應由那些法官來審判，判決的罪刑是否適當，那是另外的問題，這裏祇要說：這個法庭是有蘇聯檢察官參加的，德國國家文件，公開的和祕密的，都在法庭手中。而赫斯，第三號納粹領袖也是法庭中一個被告。莫斯科審判不是說托洛次基會與希特勒訂立協定麼？不是說赫斯是這協定底中介人麼？整代的布爾雪維克派領袖，列寧底全部助手，不是爲此罪名被槍斃，被長期監禁或被謀殺了麼？那麼，現在，好了，莫斯科審判是否冤獄可以在紐倫堡法庭上得到水落石出了。

當紐倫堡法庭開始工作時，關心蘇聯的人，對莫斯科審判有疑問的，無論會讀過或不會讀過『杜威委員會』那兩本書的，都希望紐倫堡法庭給他們的疑問以一個解答。若干共產黨員，竟荒謬到這個程度，於是與這些史大林主義者所期待的相反，法庭工作了好久，還沒有拿出一件證據來，甚至沒有提起過托洛次基姓名。於是不僅信任莫斯科審判的人，連懷疑此審判的人，也焦急了。英、美、荷、比諸國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先後簽名寫信給紐倫堡法庭，要求法庭審問被告赫斯以關於托洛次基勾結納粹的事情，要求法庭公佈一切有關於此勾結的文件（倘若有此種文件存在）。不久之前逝世的威爾斯，『世界史綱』著作者，也曾簽名在這請求書上面。最後，托洛次基寡妻又會寫信給紐倫堡法庭，要求允許她委託律師出庭，親問被告赫斯以關於托洛次基勾結納粹的事情。各國有正義感者寫的這些請求書，以及托洛次基寡妻底請求書，寄到紐倫堡法庭後，同石沉大海一般。直至法庭結束，戰犯絞死的絞死，徒刑的徒刑，釋放的釋放爲止，不僅英美諸國法官沒有問赫斯以托洛次基勾結納粹的事情，沒有拿出一件有關於此事情的證據，而且蘇聯籍法官也沒有這般做。人們乾脆無視了這件事情。紐倫堡法庭，尤其其中蘇聯檢察官，對此事情的緘默，不啻是他們大聲疾呼，向全世界公布：十年前開始的幾次莫斯科審判完全是冤獄，托洛次基及其他布爾雪維克領袖並未會陰謀反蘇，而史大林及其G.P.U.完全說謊了。

我們還能要求比紐倫堡法庭這種緘默更能說服人的證據麼？有了這個證據之後，我們對於莫斯科審判之爲冤獄還有絲毫疑問麼？

想不到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冤獄，祇消十年就可水落石出！

然而，Sayers和Kahn，『反蘇大陰謀』著作者，現在還在向我們重覆十年前莫斯科審判案底判決書！

科判決書中唯一列名的納粹，也在紐倫堡公開受審了。如此有了機會，可以偵查，為的闡明歷史的真相，顯示那些有國際意義的人物和政派之政治品格，——這機會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我們建議以下諸點：

一、應在紐倫堡審問赫斯，關於他與托洛次基會面的事情。

二、應邀娜塔里亞·塞道瓦（托洛次基寡妻）正式委任一代表來紐倫堡參加此審問，此代表有權提出問題問赫斯及其他證人。

三、應訓令那些檢查蓋世太保文件之協約國專家，來說明有無文件足以證明或反駁關於納粹黨或納粹國家與托洛次基或莫斯科審判案中被告的其他老布爾雪維克領袖之間的勾結，如果有此種文件，則應使之為大眾所知悉。

簽名：

H. G. Wells

Capt. John Baird, M. P. F. A. Ridley

Fred Longden, M. P. Dr. C. A. Smith

Peter Freeman, M. P. A. A. Ballard

George Crwell

Paul Potts

Professor C. E. M. Joad

Julian Symons

Arthur Koestler

J. F. Horrabin

Henry Sars

John Mc Govern, M. P.

E. M. King, M. P.

譯者按，以上的信，除寄往紐倫堡外，還抄寄在倫敦的英國首相，俄國大使，工黨，共產黨（史大林黨），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英國支部），以及各報館。其他若干國家自由派著名人物，也曾繼這些英國名人之後，寫信給紐倫堡法庭，可是那裏的法官（其中有蘇聯法官）始終不理會。此信第一個簽名者威爾斯已於簽名之後不久逝世了。

他們這部『劃時代的歷史秘記』雖然寫於紐倫堡審判以前，但是在這審判過程中出版呀！至少梁純夫先生底中文譯本，是現在，紐倫堡法庭結束以後，才發表的。

除了重覆 G.P.U. 底謊言以外，就『評論報』已經發表的幾章書看來，我們對於這部『劃時代的歷史秘記』還有如下的批評：

第一，『評論報』編者介紹說：『作者根據最可靠的檔案文件』。我們試看作者根據甚麼文件，并怎樣去根據文件。

書中第一章開始出現了一個美國人，雷孟·羅賓斯少校，一二兩章就是以他為線索的，關於他的事情當然是根據於羅賓斯自己寫的回憶錄。

Sayers 和 Kahn 寫道：

羅賓斯立即驅車到斯摩尼求見列甯。

『我是支持克倫斯基的』，羅賓斯坦白地說，『不過當我看見一個屍體時，我不能不承認他是屍體，因此我承認臨時政府是死了。我要知道美國紅十字會能否替俄國人民服務而不致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我不贊成你的內政計劃，不過這與我的業務無關。』（見『評論報』第二號第十八頁下欄）我們試查原來的『檔案』，看這二位作者是怎樣根據的。一九二〇年印出的『羅賓斯報告』（Rayn and Robins' Own Story）是這般說的：

布爾雪維克革命使托洛次基當政之後不久，羅賓斯就去看托洛次基。……當羅賓斯來到托洛次基房門口時，有兵士守衛着；當他進入房內時，有一個人站在托洛次基椅子旁邊，這個人立即表現得很興奮，一手指着羅賓斯叫喊道：『這是克倫斯基黨，是反革命者！』因為他曾聽羅賓斯向俄國兵士演說，反對和平，主張打德國。他又說：『這是反革命者！』

羅賓斯於是舉起手來，好像叫人不要響。他對翻譯說：『請你告訴人民委員托洛次基，不錯，以前我會用盡我的力量幫助克倫斯基，阻止人民委員取得政權。』——托洛次基皺起了眉頭。——『但是再告訴人民委員，我是同我的那些朋友不一樣的。當我看見一具屍體時，我不能不承認他是屍體，此時應當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埋葬屍體，而不是如何同屍體坐談。我承認人民委員現在得到了政權。』——托洛次基樣子溫和了一點。——『但是再告訴人民委員，如果考爾尼洛夫或加列丁或沙皇今天坐在他的位置，我也是要來找他們談話的。』——托洛次基又嚴厲起來。——羅賓斯趕快把他要說的話都說出來：『再告訴人民委員，我今天是來問他：美國紅十字會能夠留在俄國，做些有利俄國人民的事情而不會損害協約國利益麼？如果能留的，我們就留下來，如果不能留的，我們就走。』——托洛次基於是直對着羅賓斯看，而且考慮着。

以上是羅賓斯自己的報告。我們試比較『反蘇大陰謀』書中的話，詳略不同是不足為怪的，但把『托洛次基』輕輕掉換了『列甯』。而這是『根據』檔案的。

接着上段之後，『反蘇大陰謀』又說：列甯對於這位坦白的美國人立刻發生興趣。他試圖向羅賓斯解釋新政權的性質。

一位戰友之死（廣東通信）

××兄：

戰爭隔離了我們這麼久，最近纔轉帳從友人處得到你的消息，早兩天又看到了你們所辦的『新旗』，使我快活極了。過去幾年真是艱難的！戰爭以及牠帶來的一切苦難，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把人壓得死去活來，喘不過氣。我個人，幾年來的生活自然是想像以外的艱苦；不過你知道，物質的苦難對我從來不算一回事，最難熬的倒還是那精神上的隔絕與孤單，——這在漫長的歲月中，確實害得我够苦。雖然我深信：全國，乃至世界，都有我的朋友存在，而且在繼續奮鬥；雖然我又深信：戰爭總會過去，光明總要來，革命總要到。可是一種離羣的寂寞總給了我無可比擬的煩惱，這煩惱一直延續到知道了你們的消息，讀到了你們辦的『新旗』。

『新旗』證實了我的所信：不但你們存在，而且全世界我們的朋友都存在；不但你們和他們都存在，而且你們和他們都生長與發展了。這是多麼開心的事呢？世界是有希望的，人類的苦不是白吃的，——我當時就如此自言自語。

不過我想，在艱苦的幾年中，我們這些個爲現制度所最不歡喜的『叛徒』，這些個對現制度及其罪惡反抗得最激烈的戰士，縱然渡過來了，一定是有損失的。我約略聽到了陳××同志在日敵手中壯烈死難，也聽到了別的一些朋友的英勇犧牲……。我想知道他們的詳情，我要把他們的榜樣告訴我所團聚的一些青年朋友，使他們的名字與事業永遠活在他們心中。

這裏，我要先告訴你一位朋友的消息：

『他們說我是一個獨裁者，』列甯說，『目前，我的確是的。我是一個獨裁者，因爲我背後有農民和工人羣衆的意志支持。當我停止執行他們的意志時，他們將剝奪我的權力，而我將和沙皇一樣，無可作爲了。』（同上）

列甯自稱爲『獨裁者』，這是不可信的。這也許是羅賓斯造謠的罷？可是羅賓斯自己的書並沒有這段話，反之，他不厭煩地轉述了列甯關於新政權性質的話，列甯告訴他：蘇維埃制度怎樣擴展到經濟方面去，而共產主義將必然在全世界範圍代替資本主義。列甯又會告訴他：

『社會主義革命火焰也許能在這裏熄滅，但我們要儘量把牠舉得高高地，使牠能燃燒到更進步的國家去。當你將來看見「工兵代表會議」出現於柏林時候，你就知道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已經誕生了。』（見Raymond Robins' Own Story，第二頁）

論及新政府性質時，『反蘇大陰謀』爲甚麼不從『檔案』中徵引這些文字呢？爲甚麼要杜撰一段誣列甯自稱爲『獨裁者』呢？

以上舉出兩例就可以知道這部『劃時代的歷史祕記』是如何『根據檔案』的了。

第二，就『評論報』已經發表的幾章看來，我們很湊巧地發現：密探，美國的比英法諸國好，試看英國人洛克哈特，賴利之類是如何陰謀反對蘇聯，而羅賓斯則如何主張協約國家承認蘇聯！將軍，也是美國的比英法日諸國好，試看格拉菲斯少將能在西伯利亞干涉蘇聯內政，而諾克斯將軍非支持高爾察克元帥不可！此外，總統也是美國的好。『兩個名字概括了羣衆的渴求和少數人的恐懼：列甯和威爾遜。』（見『評論報』第五號第二十二頁上欄）接着，連篇累牘恭維威爾遜。

我們不知道Sayers and Karp是甚麼人。當然是共產黨黨員，但也許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罷？他們一面『保衛』蘇聯，一面贊美本國的總統，將軍和密探！他們著作的書由美國帝國主義左派代表人華萊士，貝柏，台維斯寫序文。姑不說現在國外陰謀反蘇最後的線索是操在華爾街手裏，僅就十幾年前情形來看罷，美國是在反蘇大陰謀中決不會佔據最小位置的。試想世界上大國都承認了蘇聯好久，美國還不承認哩。美國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十五年才承認了蘇聯的。

第三，我們見到的幾章中，已開始反對托洛次基了。這裏，是借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會問題列甯和托洛次基間的意見不同來『反托』的。關於這個和會的爭論，自然不能在這裏詳說，但我們祇要指出一件事實，即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布爾雪維克黨會議上史大林會公開說：『在這困難的局勢中，托洛次基底立場給了我們一條出路。』原來討論此問題時，列甯主和的意見很少人贊成，大多數人都贊成布哈林主戰意見，托洛次基底『不和不戰』意見界在列甯和大多數人中間，結果人們是先接受托洛次基意見，然後才同意列甯意見的。以上微引的史大林的話可以證明『反蘇大陰謀』中關於此和會的暗示是不合事實的了。

書中真正『反托』之處尚在後面，我們等候『評論報』發表到那裏時，再來批評牠。

但這裏，我們已經可以說，『反蘇大陰謀』一書是史大林主義的，是替現時統治蘇聯的官僚層做辯護的，而官僚層本身就是最大的『反蘇陰謀』之化身，因爲十月革命遺產，即生產機關國有制，今天已陷於危險狀態之中了。我們關心蘇聯的正是爲了牠尚保存着十月革命遺產，而不是爲了他是斯拉夫民族的國家。而爲十月革命遺產危險負責的正是史大林主義官僚層。但是這個陰謀，這個大陰謀，這個最大的陰謀，是這部書所未曾提到的，而且不願提到的。總之，這部書正是爲了幫助這個最大的陰謀而寫出來的（舒嚴）。

你也和他相熟的，這位陳仲禧同志。那年你到香港來，一位黑瘦個子，面皮略麻的造船廠工人，招待你在他家裏住了一個時期的，便是他。

過去幾年我就是和他在一起，在廣東的中山縣裏組織了農民武裝隊，始終打擊着日敵的力量。……

不過還是先讓我告訴你仲禧的生平吧。他原名陳子，是廣東中山縣濠浦鄉人，死年三十八歲。他是一個貧農之子，沒有受過教育，早年在鄉耕地為活，但由於他自己的努力，也居然能讀書寫字。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喚醒了廣東的農民，仲禧成了他們的領袖之一，他和自己的兄長都加入了共產黨，領導了當地的農民運動，他積極組織農民協會，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因此他們兄弟倆成了地主惡霸的死敵，貧苦農民的救星。在鬥爭中，仲禧一度受人狙擊，後雖治癒，他身上却始終留着一顆手彈；但他的兄長，則不幸在那時犧牲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在鄉不能立足，仲禧亡命南洋吧城，入機器廠學習，一九三〇年回香港入太古廠工作。此時他受了當時共產黨左派（即托派）的影響，參加反對派活動；以後六年，他始終留在香港，傳播托派思想，並從事於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華南支部的組織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在港編印『火星』報，在香港工人中發生了相當影響。

中日戰爭爆發後，仲禧潛回故鄉，組織自衛隊。憑了他往日的信仰，很順利地團聚了農民中的青年分子，組成了一支堅強的抗日遊擊隊。這支隊伍在中山縣麻子及橫門一帶，與日敵作戰多次。仲禧每戰總是身先戰友，每退總是親自斷後。在一次戰役中，仲禧於全部隊伍匆忙退過橋樑後，冒着敵人的槍彈，親自炸毀了渡橋，幾致受傷……。此種英勇善戰精神，博得了當地民眾與全體戰友的敬仰。不過，我必須馬上指出，我們的仲禧同志絕對

不是一勇之夫，不是張飛型的好漢，而且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者，甚至不是『抗日第一』的信徒。他始終是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他如此英勇地領導農民抗日，却絲毫不緩和了他對國內敵人與階級敵人的對立，他顧到貧農的利益，而且首先爲了他們的利益。在他的『解放區』裏，雖然力量還不足以進行土地革命，但不斷在扶助階級鬥爭的。

這一點，不但引起了土豪劣紳的不滿，不但引起了國民黨的軍政人員的不滿，甚至也引起了史大林主義者的不滿。在這些人看來，階級合作乃是抗日的前提。

後來中山失陷，接着香港也失陷了，日敵的勢焰更張，跟着漢奸的力量也大起來。過去，高叫『抗日第一』，認爲主張階級鬥爭便是漢奸的那些先生們，現在却先後做『識時務的俊傑』，競向『大事已成』的日帝獻媚了。仲禧的一點力量於是受到了多方面的迫害，他本人隱蔽起來了，躲在鄰近中山縣的珊瑚坑，祕密指揮着農民們的抗敵肅奸工作；他極其正確地執行着一個路線，就是以階級鬥爭來完成這些工作。

這樣，他更引起了全體敵人們的仇恨，他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

一個陰謀與暗殺的網撒佈出來了：當地的地主們，黨棍們，會同了日帝漢奸，組織了一個暗殺團，他們散佈在珊瑚坑附近，三三兩兩地伏埋着，想一有機會就除去這個共同敵人。仲禧很精靈，你知道，他料得到他們的把戲。敵人的詭計簡直無法實行。不過他太大膽，太自信，也可以說太大意，他還是那樣輕易出去，而且時常是隻身獨行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一次，他爲了一件工作到蒲山鄉去，步行到半路上，冷不防有人對他開了一鎗，不幸

了重傷，不準，兩個兇手一起衝上來，對他放了六鎗，我們的仲禧同志便這樣地完結了。

中山那幾鄉抗日的貧農們拾回了他的屍體，替他厚葬，還舉行了盛大追悼。這些貧苦鬥士們立誓要復仇，發願要繼承死去領袖的思想與事業。

多少年來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參加了他的鬥爭，共嘗了他的艱苦，最後，我看見了這位親愛的同志的死，也看見了他的事功如何深深感動了一些青年戰士們的心靈。我不沮喪，雖然我悲哀；我相信着我們共同事業的勝利，雖然我眼見了我們隊伍中一員大將的損折！

仲禧身後，除了他一生的光榮事蹟之外，沒留下什麼，他沒有妻，自然沒有小孩。那年，當你在港的時候，我記得你跟他開玩笑，問他爲什麼不討老婆，他開始笑着回答：『我不要』；你再問，他就比較嚴肅地說：『何必叫人作寡婦』。這話雖然帶着幾分兒戲，但又多麼清楚地透露着他獻身於革命的真誠與堅定！

仲禧死了，你讀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想一定會十分難過的；怎麼能不呢？我們這裏的朋友全都刻骨銘心地悲痛過了。這是個多麼大的損失呀！一個貧農與工人的結合，一位有經驗有勇氣的戰鬥員，一個最忠誠的國際主義的社會革命家，多麼難於尋找呀！同時，我們這事業，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又是何等迫切地需要着這樣的同志呢？我們損失不起，但是竟損失了。……但願仲禧的事蹟能替我們感召更多的工農鬥士到我們的隊伍中來。

爲了死了的朋友，也爲了我們共同的事業，希望你能把我這封寫得拙劣的信，登載在『新旗』

上。

孫桂華上 十二月十二日

國際鬥爭

編者按，我們在本欄內所報道的，都是幾個

月前，至少幾星期前的消息，因為一般通信社對於這類有關革命鬥爭的消息，大半沒有興趣隨時告訴我們，即使有此類通信，中國報紙也是沒有興趣去登載的。反之，凡能在中國報紙見到的消息，如美國煤礦工人罷工之類，則本欄儘量省略了。

荷蘭兵士和工人示威反對出兵印尼

九月下旬，荷蘭俺斯德丹城會有兵士和工人示威，為了反對壓迫印度尼西亞獨立。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駐紮在俺斯德丹城附近的哈德威克營的兵士們奉到了命令，說就要開拔到印度尼西亞去。根據荷蘭憲法，惟有志願兵才能開往海外去的，普通兵士不應服此勤務，可是荷蘭帝國主義政府頒佈一個戰時緊急命令，違反了憲法規定派遣這批兵士去印度尼西亞，鎮壓那裏被剝削羣衆底民族獨立運動。

哈德威克營兵士們起來抗議這緊急命令，他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其中含有一百五十個兵士代表。兵士們首先到荷蘭共產黨總部去，請求共產黨保護他們的憲法權利，但是共產黨拒絕了，他們於是到其他的工人組織去請求援助。

兵士委員會會散發兩種傳單，一種告兵士的，另一種告俺斯德丹城工人的。

告兵士的傳單，大意是號召兵士全體起來行動，反對開拔到印度尼西亞去，但叮囑兵士不要個人建議政變命令，即不被剝削地逃亡，因為有階級覺

悟的兵士是應當與兵士大眾在一起的，應當時刻拿自己的見解去說服大眾。如果政府不顧抗議，仍然派遣他們到印度尼西亞去，他們就應同那裏的工人和農民聯歡，幫助他們獲得獨立。

告工人的傳單，大意是號召工人起來贊助兵士這個要求，反對政府那種帝國主義行動，碼頭工人尤其要拒絕裝載軍火。

這兩種傳單轟動了整個俺斯德丹城，因為這是兵士大眾自己在街上散發和張貼的。

在兵士委員會主持之下，全城多處舉行露天大會，兵士和工人成羣地參加。二十一日夜裏，示威的羣衆與憲兵衝突，一個兵士在衝突中死了。為了抗議憲兵和警察這種野蠻壓迫，二十三日早晨電車工人罷工，次日早晨市政工人，碼頭工人，印刷工人也跟着罷工，次日下午全城總罷工。政府認為是『意想不到的』。警察用槍彈和刺刀驅散憤怒的羣衆。

運動發展到高度時，荷蘭共產黨也來參加了。在共產黨召集的一次羣衆大會上，也提出了停止派遣荷軍去印度尼西亞的要求，以及印度尼西亞停止戰爭的要求。共產黨允許將這問題提到議會去討論，在此諾言之下，兵士和工人也允許終止罷工和示威了。

第四國際荷蘭支部，『革命共產黨』是荷蘭一切工人政黨中唯一公開宣布其同情兵士要求並主張工人應與兵士聯歡的。

荷蘭兵士和工人是同情贊助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的，可是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自身，同所有殖民地運動一般，分為兩種愈來愈分歧的傾向：上層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傾向，下層的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傾向。前者害怕後者抬頭，於是極想同帝國主義妥協，祇要帝國主義多給他

們一點利益，至於民族能否達到真正獨立，則是次要的問題。後者則誠心要求民族獨立，因為在現在的世界，殖民地民族獨立和殖民地工農解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印度尼西亞，代表前一傾向的是沙里爾政府，代表後一傾向的是湯·馬拉加領導的一個政黨。

湯·馬拉加本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創立者之一，但後來與第三國際政見分歧，遂與正式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分開了。他主張一切工業社會化，反對與荷蘭帝國主義妥協，而主張武力鬥爭直至真正獨立而後已。去年春天，湯·馬拉加和他的同志二十多人被捕了，捕他們的還不是荷蘭或英國帝國主義軍隊哩，而是他們的同國人蘇嘉諾，沙里爾及其政府。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底機關報否認湯·馬拉加是共產黨員，而說他是『托派』。九月間，一個荷蘭人，名佛郎慈·戈德哈特的，旅行了印度尼西亞回來，在俺斯德丹城向新聞記者宣布：『湯·馬拉加，蘇巴約，及其他二十多人，他們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所謂托洛次基主義者，他們的政治目的是要維持這混亂狀態，他們不久就要受審判了。其中有幾個人將判決死刑。』佛郎慈·戈德哈特本是共產黨員，現在則是荷蘭『勞動黨』底國會議員。

這個審判將是一個信號，表明荷蘭帝國主義和印度尼西亞資產階級要攜手共同撲滅印度尼西亞一切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真正的民族獨立運動。（盛）

意大利革命運動

十二月十三日，法國新聞社消息，意大利巴杜亞城人民暴動，反對英國佔領軍。通信社把這消息當作偶發事件，或者如盟國代表團長史東孫說的，『交通意外事件』，其實這乃是意大利革命運動之一種表現。意大利全國久已在騷動之中，不過那些

通僧社沒有報告我們罷了。

意大利是軸心國中最早戰敗的，最早受英美軍隊佔領的。意大利人民以自己的手推翻了法西斯政制，殺死了莫索里尼，當時就是革命的行動。以後在英美軍隊佔領下，人民生活到了極點，大家都想起來革命，可是沒有一個革命黨來領導他們。所以革命運動，自發的，此起彼伏，全國各地都有，但未曾匯合為一股洪流。拿去年九月一月間發生的事情來說，就有下面幾件：

九月六日，在北意，政府雇員罷工，起初是孤立的行動，但不久很迅速展開了，瀰漫於波河流域諸省，採取的鬥爭方式非常激烈。在威尼斯，有三千人示威，攻擊警察局。離城不遠的梅士特爾地方，示威者封鎖一切交通，罷工者和失業者搗毀黑市商店，直至裝甲汽車開了來才罷休。在米蘭，罷工風潮如此高漲，連法院雇員，包含受驚的法官在內，也參加了罷工。

產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百，因為通貨膨脹得太迅速了。幾千失業工人也舉行了示威。總工會領袖維多里奧要求政府解決，「否則意大利全國都要罷工了」。

十月九日，在羅馬，有工人和退伍兵士，約三萬人，在政府宮前示威，領導者是一萬五千築路工人，因為政府辭退他們的工作了。示威者與憲警衝突，死了二人，傷了百餘人，一部分人居然衝進鐵門內，搗毀了玻璃窗和木器；在外面的也會把警察拖下馬來，解除了兩輛警察吉普車底武裝。最後政府讓步了，收回了辭退工的命令。

在鄉村，農民并不落在工人後面。羅馬近郊，沒有土地的農民佔領了約五萬公頃的土地，而且組織了糾察隊，阻止警察和憲兵從羅馬出來干涉。在較落後的南意，也有同樣情形發生。安齊奧地方，

根據議村全村居民佔領了兩個大地主底土地，共一千七百五十英畝。村長（一個共產黨員）和村神甫也參加了這個運動。憲兵不敢干涉。

意大利有些大地主甯願讓土地荒蕪着，據說全國至少有二百萬英畝土地沒有耕種。沒有土地的農民不管一切，把麥子種在那上面，可是地主放牛羣來吃這些麥子，於是農民拿叉子把牛羣逐出去。這種事情發生了好多起。

在北意，阿斯普地方，以前當過遊擊隊，而現在編入警察補充隊的三十人，為了不滿意政府措施又攜帶槍械上山去了，他們說是要「為新的民主的意大利」而鬥爭。二天之後，這三十人增加到四百人。他們宣言道：「我們又拿起武器來，因為這十五個月中，人們沒有做一件事情來實現我們當初鬥爭的理想。」

城市和鄉村的運動固然未曾匯合為洪流，但意大利經濟仍然在崩潰下去的，政治仍然不得穩定的。政府現在是用高喊領土問題為手段，來轉移饑餓的羣衆去注意外交，而忘記內政上的危機。但這手段，最後是不能奏效的。現在，全國有六百萬人因失業而瀕於餓死。真實的工資，據官廳統計，僅及失業前百分之五〇至六〇。總有一天，全國散碎的自發的革命行動能匯合起來，那時意大利歷史就要開始新的篇幅了。（盛）

在意大利的德國戰俘要求回國

在美軍管理之下，意大利列洪比薩區數千德國戰俘，於九月間實行怠工。他們說：「我們要回家去，我們的妻兒在家裏沒有飯吃。誰養我們的家呢？我們不是奴隸！」美國軍事當局答應儘可能快送他們回德國去，叫他們停止怠工，否則要嚴厲處罰，可是其中大多數人仍不肯停止。他們遂被送入集中營去了。美國地中海軍區司令約翰·李中將發表

聲明，說情形並不嚴重，因為『戰俘要求的，主要是在為自己能獲得更多的自由，為他們在德國的家庭能獲得若干物資的幫助。』可是司令避免提起戰俘底最大要求：回國。

據統計，德國戰俘，在美國管理下的有二十萬人，在英國管理下的有五十萬人，在法國管理下的有七十萬人，在蘇聯管理下的則有四百萬人。這些勝利國並不急於送德國戰俘回國，因為要利用做賤價勞動力。英法二國政府甚至把德國戰俘租賃給私人資本家，替私人產業做工作，以抵制本國工人底壓力。

德國銀行家和工業家，由紐倫堡戰犯法庭宣布無罪了，但德國工人和農民被納粹政府徵募來的，反須替戰爭負責任，過着奴隸勞動的生活，同希特勒野蠻的集中營下差不多一般的生活。（盛）

墨西哥農民也奪取土地

九月間，墨西哥拉克斯加拉州也發生了武裝農民奪取五十處大地產的事情。農民要求這些地產還給他們，作為他們公共耕種的『ejidos』。九月二十五日，墨西哥總統加馬卓派農業部長龐察列，到那裏去調查此事，並勸農民將奪取的土地歸還地主。農業部長調查結果，做了報告，並不否認農民有急迫的土地需要，不過反對農民用此種『違法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報告中又辯明外間傳說的暴行是誇大了的，農民並無武裝。可是軍區司令仍舊訓令奪取的土地交還，才顧慮他們的要求。農民退出土地了，但調查團一走，農民又回來佔據。（盛）

農業部長拿軍隊討伐來恐嚇農民，叫農民先把

美國畢慈堡「杜格生電燈電力公司」，九月十

日，工人罷工，資方運動法院頒佈一個『禁令』不

僅禁止糾察隊及其他種種活動，而且禁止罷工本身

。工人不理會這個禁令。畢慈堡是有名的重工業城

市，電力停止，影響當然是很大的。九月二十四日

，法院傳訊工會負責人。這一日，早晨九點半鐘，二千五百電力工人都到法庭來聽審，法官控告工會

主席穆勒以藐視『禁令』之罪，要他當衆悔過，否則判罪。穆勒拒絕了。於是法官判決他一年徒刑，

立即解監執行。美國勞動聯盟屬下的電氣工會願出一萬現金保他，法官也不許。進一步，法官又要判決罷工委員會其他九個委員以同樣的刑罰，倘若他們『不下令於次日早晨十點鐘終止罷工』。這消息傳出，法庭外幾千工人都叫喊起來。『我們要穆勒

！人們要衝入法庭去，騎馬的警察用力阻止他們

。法官限定罷工領袖於當晚發出終止罷工命令。次日早晨，全城工人舉行同情的罷工，一萬工人包围

法院，高喊『打倒禁令！』下午一點鐘，一個書記官走出來，宣布：禁令取消了。穆勒及其他的人們沒有罪了。罷工還在繼續下去。（盛）

印度紡織工人罷工

在尼赫魯政府成立之後，印度馬德拉斯會發生一次大罷工，參加者有一萬四千紡織工人，其中大多數屬於馬德拉斯工會。工會新選的會長，名安東尼皮萊，是托洛次基主義者，新從獄中放出來的。此次紡織工人罷工就是他領導的。

資本家們無論如何想法破壞罷工，都不成功。雖然若干領袖被捕了，雖然法律來干涉糾察活動，工人還是繼續罷工下去。中間舉行一次祕密投票，決定應否繼續罷工，贊成者有五千票，反對者祇有三十七票。

在馬德拉斯的國大黨政府，宣布：『罷工糾察

須和平行動，完全不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接

着禁止幾項行動，其中包括『橫臥路上妨害交通，

……叫喊足以傷人身體之口號』。印度第四國際支部機關報『火花』評論道：『口號怎能傷人身體呢？我們不懂。至於橫臥路上，則正是甘地宣傳的非

暴力運動之標準方式。難道甘地一黨的人做得，工

人就做不得麼？』（盛）

希臘史大林派和托洛次基派公開辯論

九月間，希臘共產黨總書記查哈黎亞德斯，在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上正式向第四國際希臘支部，即國際主義共產黨，提議公開辯論兩黨間現存的分歧政見。國際共產黨接受這提議了。雙方派出代表，簽訂了如下的書面協定：

希臘共產黨和國際主義共產黨（第四國際）爲了辯論會能完滿進行起見，決定如下幾點：

一、第一次辯論會論題是『希臘國內局勢及工人階級立場』。

二、第二次，第三次等等辯論會論題，由雙方各自提出，論題若有爭執時，以投票決定之。

三、辯論會技術方面，由雙方代表合組的一個組織委員會負責。

四、第一次辯論會應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雅典城中心區一個戲院或一個會堂舉行。

五、雙方各派一人組成主席團，此方代表發言時由彼方主席主持會議。

六、雙方各派二人發言，雙方第一人發言各限三十

分鐘，第二人發言各限十五分鐘，做結論的人發言各限二十分鐘。每一發言人可問五個問題，每個問題二分鐘。

七、提出論題的黨先發言，以後他方發言，然後其他二發言人發言。

八、與會者爲雙方黨員，同情者，及無黨派的工人，經雙方邀來者，與會邀請書由組織委員會印出，交雙方負責分發。

九、雙方發言人演辭須於開會前寫好交給主席團，問題和結論則用速記，這一切演說稿審查無訛後，交付組織委員會印成小冊子，公開發售。

十、每次辯論會開後，聽衆有權表示其意見，即在紙上寫明他贊成何方意見，然後於離開會堂時將紙投入一特製票籠內。雙方各派一黨員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來開票算票。

十一、每次辯論會開後，聽衆有權表示其意見，即在紙上寫明他贊成何方意見，然後於離開會堂時將紙投入一特製票籠內。雙方各派一黨員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來開票算票。

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戰爭，共產黨對此戰爭的立場，新戰爭底危險。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於雅典簽訂

但第一次辯論會直至十月十三日才舉行。那日到會的共有七百五十人。雙方第一個發言人說話時，還是論爭性質，但共產黨第二個發言人則一開始就說謠謬的話，國際主義共產黨第二個發言人繼起指出共產黨有將政治辯論轉移爲謠謬之企圖。會場上有許多問題提出來，分別由發言人回答了。投票結果，贊成希臘共產黨的有五百四十二票，贊成國際主義共產黨的有一百八十九票。以後的辯論仍將舉行。

這是自從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分裂以來第一次，兩派之間能成立一個協定，又能公開辯論的。主要的當然是因爲希臘羣衆在革命發酵中，希臘托派又能以其在戰爭中和階級鬥爭中的英勇行動給羣衆以影響。連史派內部也動搖起來了。起初查哈黎亞德斯在史派機關報上大寫文章反對第四國際底主張，但這些文章沒有說服效力，爲羣衆所逼，所以有

此提議。同樣情形，也發現於意大利和捷克兩國共產黨中，雖然沒有像希臘這般具體化。

贊成史派意見的票數超過贊成托派意見的票數，約為三與一之比。這也是表明希臘工人革命意識尚未成熟，雖開始左傾，大部分尙陷在史大林主義泥濘之中。我們試想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布爾雪維克派直至十月暴動前幾個星期才能在首都蘇維埃中勉強獲得多數，便可明白了。（盛）

社會主義青年團體開國際會議

十月初，世界各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在巴黎召集一個國際會議，參加的有十幾國青年團體。會議目的是要創立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國際』。結果，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即不能成立一個真正革命的『國際』，祇能成立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國際聯

說會』，爲了聯絡各國青年團體間的感情和交換意見。

所以不能成立正式國際的，是爲了挪威，瑞典，丹麥諸國青年團體反對和波蘭，保加利亞，捷克諸國青年團體反對。前一類國家青年團體反對，是因爲牠們受改良派政策影響太深；後一類國家青年團體反對，則是因爲牠們在史大林派支配之下。

但其他的國家青年團體是不以『聯誼會』之成立爲滿足的，牠們合組一個委員會，爲了促進『青年國際』之實現而奮鬥。爲此，牠們發表了一個宣言，說明此次沒有達到目的之原因，是由於現時工人運動中的思想混亂，並號召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智識者，青年婦女，以及殖民地被壓迫的青年，團結於未來的『青年國際』周圍。宣言簽字者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 國 革 命 悲 劇

（續）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磊 譯

孫文常常愛說中國沒有貧富之分，祇有大貧和小貧之分。他若能多活一個時候（他死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就可看見：當大貧要變爲小貧之願望，與小貧要變爲富人之願望起了衝突時候，將發生甚麼事情了。他就可看見，在國民黨中形成起來的所謂『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將如何以同時間一般不可伸縮的邏輯，分解爲兩個不可和解的陣營，即一面貧得不堪設想的羣衆反對另一面少數過優裕生活的小貧了。他就可看見，一種社會事實，他至死沒有承認的，如何明白地顯示出來了：這就是階級鬥爭。因爲當羣衆運動不斷地抬高其水平時，當牠繼續擴大而深入時，牠所引起的一切階級問題都走到舞台前面來了。工人決不會長久繼續着清楚劃分中國老闆和外國老闆的。農民也不會長久滿足於那些微末的諾言，而不爲自己利益行動起來。工人和農民一經越出那些界限以外，所有的私產主人，資本家和地主，都集合力量，迅速反攻了。

自然，中國資產階級甯願在分贓基礎上與外國人妥協，而不願走着那正在

替外國資本當經紀人的買辦，代表資產階級中一個有力部分，其利益與帝國主義利益糾纏着，因此往往與其他部分資產階級底國民革命目的相衝突，其資產階級是夢想着在工業和商業方面與帝國主義競爭的。買辦，一開始就反

，有美國，意國，德國，奧國，比國，猶太，希臘，盧森堡，羅馬尼亞，瑞士，法國，共十一國青年團體。這個委員會，由法國的索德勒，意國的索拉里，奧國的史特拉賽三人負責。

宣言中，在政治方面，明白主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階級合作，各國無產階級應首先脫離本國資產階級影響，提倡國際主義，紀念國際青年運動導師李卜克內西，反對教士愚民主義，軍國主義，沙文主義。

宣言最後邀請『民主青年團體世界協會』所屬分子，爲某一具體行動，即凡有利於勞動青年革命鬥爭的行動，來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體，作各國的和國際的合作。

對新的國民革命運動，他們利用舊的軍閥，而且被帝國主義利用來保持現狀。在某些情形，如在一九二四年廣州情形，買辦組織了自己的武裝隊伍，直接向孫文政府挑戰。但是，一般說來，這種抵抗底主要武器還是舊軍閥，他們的力量是建立在鄉村地主和城市買辦之上。

這部分資產階級底政治代表人是老國民黨中那些右派分子，他們是最老的，最腐敗的，最保守的，因之是最近視的，他們久已做了軍閥底祕書和附屬品了。他們一開始就反對孫文底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當一九二四年第一次黨大會採取這個路線時候，他們就起來反對，而且立即組織一個反對派，自稱以『救黨』為目的，因為他們信為國民黨有亡黨危險的。他們覺得，同外國列強切實安協之道路，已不可挽回地阻斷了。

他們有一篇宣言說道：『自從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加入以來，共產黨對於推翻英法美日帝國主義的宣傳，其目的就是要毀壞國際人士對於國民黨的善意。……共產黨意圖消滅國民黨。』各種救黨組織產生出來。其中分子大多依附於北方的和東北的反動軍閥。他們奔走於北京，天津，上海，香港之間，組織，宣傳和進行陰謀詭計。孫文一死，他們就提出了口號，說要保持純粹的孫文主義，免受不肖門徒底『布爾雪維克主義』所損害。他們的重要團體之一，就叫做『孫文主義學會』。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們在北京郊外西山開會，此後，他們因此會議得到了『西山會議派』稱呼。他們自認為是主張與帝國主義列強妥協政策的。事實上，他們不過是替這種妥協鋪平道路罷了，到了那一天機會最好時候，這種妥協將要實現的。

外國人方面，因為處處受了羣衆運動阻礙，不能順心如意，不久也開始表示：願意在妥協基礎上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起初，他們似乎還認為鴉片戰爭和義和團時代用的強盜手段就已足夠了。可是其中更聰明的人不久就明白，不是很愉快地明白：時代已經改變了。英國底威脅手段，說要使用武力來支持廣州商團，結果並未能阻止這個反動的武裝隊伍於幾個月之後被消滅。第二年，上海，青島，漢口，廣州街上，帝國主義放的炮火，不僅未能嚇退中國人，反而助長了以前播下的革命種子。外國槍彈播在中國土地上，長出了幾千幾萬的革命新苗。列強一面固然不忘記他們的強硬的武力政策，但他面還是在尋覓補助的手段，即積極支持一切可能的反國民革命力量。我們已經看見，當一九二五年東江戰爭時，香港如何公開以軍火和金錢供養陳炯明了。不幸，陳炯明沒有出息。當北方，馮玉祥底國民軍，同情於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年末去進攻東三省大軍閥張作霖時候，日本軍火和金錢替張作霖盡了保衛責任。當張作霖一

個部下郭松齡倒戈，這位大軍閥岌岌可危時候，日本軍隊竟親自投入戰場，粉碎了反張作霖的攻勢，以此阻止了國民革命運動在北方發展，至相當的時期。

人們開始聽到號召，要外國剝削者和中國剝削者團結一致了。當上海總罷工達到高潮時候，老牌帝國主義報紙，字林西報，對上海有錢人說：『由於多年同你們結交友誼關係，我們知道你們是不會同情於暴徒和罷工者的。』字林西報請他們表白他們『並未站在那些搗亂治安的工人方面。……此次使你們的和平，幸福和安全陷於險境的亂事究竟要延長多久，那大部分是取決於你們自己的。……』外國人急忙表示他們準備討論那具體性質的妥協，為了保衛他們的傀儡北京政府，以抵禦國民革命運動底威脅。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議定的條款，關於中國關稅權問題和治外法權問題的，久已無人理會了，現在急忙提出來。一九二五年十月，特別關稅會議開會於北京，結果允許中國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享有關稅自治權。一九二五年末，又有一個有關治外法權的國際委員會成立，來幫助中國進行立法的和司法的改革，拿華盛頓決議案底話來說，這些改革『將致使列強放棄（漸進地或非漸進地）其各自的治外法權。』一九二六年初，英國派來一個特別委員會，為了商議英國部分庚款基金之用途。列強便是以上述種種來散佈希望和諾言於中國資產階級面前的。

列強獲得愈來愈多的應聲了。逐漸擴大的罷工潮並不以外人企業為限。甚至中國那些『自由派』，能够承認工人運動已經『造成了普遍全國的社會意識，其主要目的就在建立一個新的強有力的共和國，』（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密勒氏評論報》，*Chen Ta* 寫的『新國民革命中的工人運動』）——甚至這些『自由派』也很不愉快地看見運動『愚蠢的過火，例如中國產業罷工底迅速增加。』（同上）工人運動有用處，人家是承認的。外國人不是爲了工人運動原故允許幾種妥協條件了麼？但是人們愈來愈加感覺到，『利用工人，是一回事，……任他們吞了比他們所能消化的更多的東西，又是一回事。』享受着『有強大組織的工人運動之利益是很好的』，——『但一件事情太好了，往往反有害處。』（見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三日，《密勒氏評論報》，*Samuel H. Chase* 寫的『廣州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分析』。）

當工人重重打擊外國資本家底要塞時候，人們的確是很高興的。可是，當工人，反乎孫文所想像，竟不分別中國雇主和外國雇主時候，事情就完全兩樣了。工人這種很可惋惜的缺乏判別力，不久就使得中國廠主覺悟，他們原來是與外國敵手同乘一舟的。工人運動每前進一步，中國資本家這種覺悟就更明白一分。此外，幼弱的中國工業家對於外國人的依賴，又是大明顯的。在上海，

這個全國最大的工業中心，中國工廠甚至依賴一家外國公司供給電氣。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以後的總罷工中，外國人以斷絕電力，使中國工廠一切機器都不能轉動，為報復手段。這件事使得總商會那些高等華人很迅速地屈服了。他們威脅來叩外國人底門，大修改罷工工人當初提出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要求。他們已決意同外國人和解了。他們自己的利潤是依賴這種妥協的。他們止付了支持罷工工人的基金。漸漸地，罷工運動軟弱下來了。夏末秋初，管轄上海的奉系軍閥，與租界當局合作，又得到總商會完全同意和贊助，封閉了上海總工會，搗毀和查封了一百二十處工人俱樂部和其他組織。上海罷工潮暫時停滯了，在冬季幾月中都處於消沉狀態。

在這期間，中外有錢人更加大膽地互相勾結了。初時是沒有遭遇甚麼困難的。雙方各自組織反赤團體，出版激烈的反赤宣傳品，而且當衆拍胸演說。一個英國人，瓊士先生（Mr. Jones），叫喊道：『我呼籲你們去替中國保存牠的古文化底極可寶貴的遺產！』這些紳士如此敬重中國過去的遺產，確是能令人感動的。

公司經理結算了帳目，發現沒有甚麼錢賺，於是在股東會議上做報告道：『我們希望，以後當局能採取嚴厲的手段來制裁那些職業的煽動底活動。』

他們要求的『嚴厲手段』果真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採取了，這一日，在北京，執政段祺瑞底衛隊向示威的學生開火，殺死幾十個男女青年，他們是來向段祺瑞抗議政府之決意屈服於外國要求解除天津港口武裝的最後通牒的。

此次屠殺，乃是北京的布景，來襯托上海一齣不諱常戲劇的。

那天晚上，在上海大華飯店，工部局董事會各位外國董事，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社會諸君，共同聚餐。這件事，被人稱為『上海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如此儕儕一堂，這是上海歷史上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密勒氏評論報》）在那些傲慢的外國人看來，這的確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因為他們向來是屏除一切中國人於他們的俱樂部外面的，不管那一階級的中國人。這天夜裏參加聚餐的，有中國銀行家，買辦，大商人和政府官吏，他們受了外國人奉承，覺得很得意。工部局總董，那個美國人，代表他的英

國同僚和日本同僚致辭，說道：『我們做東道主的，很榮幸，能得諸位光臨，諸位是極有身份的中國紳士……陶鑄着和指導着一種極偉大又極神奇的力量，就是輿論。』

這位致辭者費信謹（George Fessenden）於是說到本題。當局已經預見到有禦事發生了，必須採取一些『先導預防的步驟』。武力是要用的，但這個手

段也有其缺點，即能『迅速造成一種很嚴重的國際局勢，如以前所發生的那樣。』仲裁手段『多半會失敗』。上海工人似乎容易上當，那些『第三方面人物』誘惑了他們，使他們不顧工廠死活。那麼我們為甚麼不來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那種容易信從的性格呢？……為甚麼不來利用那種性格，為他們好處，兼為他們好處呢？為甚麼不培養另一種領袖，與他們慣常聽從的領袖不同的呢？他們也可以聽從這種新領袖，同聽從那種舊領袖一般的。……我覺得，我們需要像今晚光臨的一類的人才。……』

銀行家兼買辦虞洽卿起來致答辭，他說：『我們完全認識這極端緊張的局勢。……我們說，現在同去年發生的事件時候一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我們這般說決非誇張。為了我們相互的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去防止燎原之火發生。』時機很迫切，不能再拖延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一個的和國際的範圍內大家來協議，舉配合行動，為儘可能快地，儘可能滿意地解決我們的未決問題。』接着，虞洽卿單刀直入說：和平是好的，『但說老實話，我們並不惜任何代價去求取和平。』外國人必須相當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尊重』等原則。就目前來說，那麼外國人必須讓中國資產階級參與上海行政。

三星期之後，外國納稅人開年會，通過了上海工部局增設三華董的議案。這是第一次，有華董在上海工部局內。這是一種買賣。（未完）

告讀者

從本期起，『新旗』祇能每月出版一期了。主要是爲了沒有錢。在這一年頭兒，出刊物總是件虧累的，我們這個窮人所辦替窮人說話的刊物，更加虧累不起。從第九期起，我們在報攤上又受了阻礙，反過來更加重了虧累。我們本想學『周報』和『民主』，也來一個『休刊』。可是一想起你們，本刊底讀者，我們又提起勇氣來了。在全國廣大的讀者羣中，你

們所佔的分量雖不算多，但你們的鼓勵和同情，如若干來信所表示的，是很能令人興奮的。何況本刊在中國是唯一的刊物，代表現今世界上一種思想，一種主張，一種傾向，……唯一能指示世界人類真正出路的傾向。沒有別的刊物能代替我們，即使稍微接近的刊物，也沒有。難道中國不能繼續擡持這一面新的旗幟麼？我們努力擡持着，籲請你們，本刊讀者，協力來擡持着，籲請你們給予『新旗』以可能的援助，包含印刷費的捐助以及介紹和推銷。